

理性主义的局限与有机性的超越：论霍米亚科夫历史哲学的批判与建构

谢淑娟^{1*}

(¹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6)

摘要: 早期斯拉夫派成员霍米亚科夫历史哲学的建构始于批判德国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哲学。霍米亚科夫认为,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具有片面性的缺陷, 即概念化地认识历史, 其认识论基础——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因未解决主体二元论矛盾而无法获得整全的真理, 其从“我思”到“我在”的认识路径造成了认识历史的唯理性。为超越西方理性主义窠臼, 斯拉夫派以“完整的精神”认识真理, 形成与存在相融的有机的思维, 遵循从“我在”到“我思”的认识路径, 霍米亚科夫由此发展出以“诗人和艺术家的感情”直觉地认识历史的方式, 以弥补理性主义历史哲学的片面性。同时, 霍米亚科夫将德国浪漫主义的“有机性”概念引入历史哲学的建构中, 主张历史是由信仰及其精神原则推动的进程, 强调俄罗斯社会的有机传统与自由精神, 试为俄国未来道路选择提供历史支撑。

关键词: 霍米亚科夫; 斯拉夫派; 历史哲学; 黑格尔; 有机性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6.v1i5.1488>

The Limitations of Rationalism and the Transcendence of Organicity: Criticism and Construction of Khomyakov's Historical Philosophy

Xie Shujuan^{1*}

(¹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Guilin, Guangxi, 541006, China)

Abstract: As a member of the early Slavophiles, the construction of Khomyakov's philosophy of history emerged from his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the German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epitomized by Hegel. Khomyakov contended that Hegelian historiography was characterized by a one-sided conceptualization of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rooted in the epistemological framework of German idealism, which failed to attain comprehensive truth due to persistent dualistic contradictions within the knowing subject. The Cartesian-inspired epistemic trajectory from "cogito" to "sum" led to an over-rationalized and abstract approach to history. In response, the Slavophiles proposed an alternative epistemology grounded in the "integral spirit", advocating for an organic mode of cognition aligned with being and following a movement from "sum" to "cogito". Building on this foundation, Khomyakov formulated an intuitive method of historical c-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陀思妥耶夫斯基现代性思想研究》(项目编号: 21FWWB012); 2025 年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新文科视域下外国文学史课程与区域国别融合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编号: 2025JGA135)

作者简介: 谢淑娟 (2000-), 女, 广东东莞, 硕士, 研究方向: 19-20 世纪俄罗斯文学、思想史

通讯作者: 谢淑娟, 通讯邮箱: 610952551@qq.com

omprehension through what he termed "the sensibility of poets and artists", thereby offering a corrective to the limitations of r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Furthermore, he integrated the Romantic notion of "organicity" into his philosophical system, conceiving history as a dynamic process animated by faith and spiritual principles, while underscoring Russia's organic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its inherent spirit of freedom, thus provide historical support for the choice of Russia's future path.

Keywords: Khomyakov; Slavophiles; philosophy of history; Hegel; Organicity

引言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主要国家迅速进入现代化进程,而地域上边缘、时间上迟到的俄罗斯在这一进程中仍处于“落后”状态,俄罗斯未来道路问题因此成为知识阶层关注的焦点。1836年,恰达耶夫(Пётр Яковлевич Чаадаев, 1794-1856)《哲学书简》(Философические письма, 1836)引起的舆论“最终使这一思考演变成一场关于俄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历史性大争论”^[1],在这一讨论中出现了意见相左的斯拉夫派(Славянофил)与西方派(Западник)。伴随对俄罗斯未来道路选择问题的是俄国知识分子对历史的浓厚兴趣,如别尔嘉耶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ердяев, 1874-1948)所说,“独立的俄罗斯思想是在历史哲学问题上觉醒的”^[2]。其中,早期斯拉夫派的主要成员阿·霍米亚科夫(Алексей Степанович Хомяков, 1804-1860)、伊·基列耶夫斯基(Иван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иреевский, 1806-1856)等人主张俄罗斯走一条源于俄罗斯历史的、独具民族性的道路,这给斯拉夫派划定了两个任务,一是在“西方与俄罗斯”的框架下探寻二者差异以确认俄罗斯在世界中的位置及其未来使命;二是为自身社会理想寻找历史支撑。斯拉夫派对俄国道路的构思离不开对西方的评判和对俄罗斯历史的观照,其哲学探索首先指向对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反叛。人的精神生活是斯拉夫派历史研究的起点和核心,他们以宗教的、历史的态度看待西方精神生活,认为西方的衰落暗含在其历史进程中。西方精神生活的悲剧源于理性的片面发展和精神的内在分裂,而斯拉夫民族的精神生活具有和平、自由、有机特质,说明这些特质在社会生活与宗教生活上的体现,是斯拉夫派历史研究的目标。

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大革命的挫败使人们丧失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带来的诸种理想信念,诸多新思潮风起云涌,其中,“德国浪漫主义(其主观、神秘形态及民族主义形态),尤其黑格尔运动,取得支配地位”^[3]。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及浪漫主义运动在当时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中得到了广泛地关注,影响了包括霍米亚科夫在内的斯拉夫派成员。斯拉夫派一方面接受德国哲学家的影响,一方面在对其进行评判的基础上进行创造。霍米亚科夫所受影响是多方面的,他去过法国、德国等地,可以用俄语、法语与英语进行写作,他对西方的印象及对西方哲学的理解是其哲学思想形成的基础,东方教父的著作、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德国浪漫主义都是他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由此,霍米亚科夫成长为一个思辨型的作家,其许多思想是在分析与反思他人观念的过程中形成的。在历史哲学领域,霍米亚科夫批判以黑格尔(G.W.F.Hegel, 1770-1831)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哲学的片面性,这一片面性又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理性的高度发展密切相关。此外,浪漫主义史学及德国浪漫主义者提出的有机性概念也一定程度上启发了他。

霍米亚科夫的历史哲学,以对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理性主义历史哲学的反思与批判为起点,最终经由一条浪漫且有机的认识路径而成。霍米亚科夫认为西方现代历史科学粗糙而形式主义,尤其是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历史哲学具有片面性,一是削弱斯拉夫民族的历史作用,二是逻辑理性地理解历史。由此,霍米亚科夫给自己设定了“补充欧洲兄弟的劳动成果”^{[4][37]}的任务,并坚信俄罗斯作家比西方作家更可能获得对历史的生动理解。

1 对理性主义历史哲学片面性的批判

在进入历史哲学的领域之前,霍米亚科夫首先说明了他对西方世界知识发展的看法。自启蒙运动以来,尽管知识体系迅速增长,但人的心智发展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变得越来越狭窄。这是因为启蒙远离了人们的生活,在科学中“存在一种腐朽的分析,一种没有深度也不重要的分析”^[4],使人的心智发展陷入了最狭窄的范围内,而只有感受到生活之丰富性的人才能发展出高级的分析能力,科学才能拥有其发展所必需的真正的内在自由。霍米亚科夫指出,启蒙与生活的差距导致“人的所有能力都消失在缺乏创造力的肤浅心智的片面发展中”^[4],而人类的心灵不能停留在这种片面的境地中。完整性之于人的心智发展是最重要的,这意味着在认识的过程中要超越经验与分析,贴近生活,获得一种创造性的综合能力。在此,霍米亚科夫谈及了一个在今后的论述中不断出现的论题,即“片面性”与“完整性”的对立。完整性精神首先出现在霍米亚科夫的认识论思想中。霍米亚科夫在批判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的二元论矛盾时,就暗含着对人完整的认识能力的追求,并进而发展为对人的精神完整性的追求。“完整性”的指向是多方面的,在宗教哲学上体现为聚和性哲学,在历史研究中体现为有机的历史哲学。

对于西方科学发展的片面性,霍米亚科夫已经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多方面说明了这一点,他还要“在历史科学方面更详细地这一点”^[4]。十九世纪初西方历史科学的兴盛引起了霍米亚科夫的注意,但他认为当时的历史研究并未达到真正科学的高度,因西方历史的一般体系呈现为一种粗略的特殊主义,西方历史学家对各项历史事件的叙述缺少内在联系性,追求客观考证但视野较为狭隘:“作者或多或少的机智、或多或少的艺术性叙述、对文献或多或少的忠实度、个人猜测中细节或运气占多少的程度——构成了现代历史著作之间唯一的区别:在兰克和哈兰……那里,历史体系依然如故,梯也尔和施洛瑟的作品如出一辙,都以有趣但浅薄、短视的方式讲述刚刚过去的重大事件”^[4]。

霍米亚科夫将德国哲学视为当时西方哲学发展的顶峰,德国历史科学相应也成为他考察的对象。他在著作《世界历史札记》(Записками о всемирной истории)中指出德国的历史科学的片面性体现在对斯拉夫民族的偏见和对历史的概念化思考中。在对待斯拉夫人的历史时,“德国评论家们的错误就如此明显,其失误如此可笑,盲目性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不知道该把这种奇怪的现象归咎于什么”^[5]。他们的陈述削弱了斯拉夫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有一次他们把斯拉夫人说成是印度—日耳曼家族中人数最多的成员,这样做反而剥夺了斯拉夫人的祖先,让他们呈现出像无根的大树那样的荒谬模样”^[5]。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历史科学,处于以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史学向以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演进的过程中。兰克学派重视史料的收集与辨别,依据史料客观公正地叙述历史,其优点如霍米亚科夫所说:“公正和真实已成为学界的共识,这种荣誉尤其属于勤劳而直率的德国,它无疑为所有其他国家提供了动力和方向”^[5]。其缺点也很明显,即对抽象概念抱有巨大的热情,使得“一切有生命的事物,在抽象概念面前都失去了意义和重要性,逐渐被枯燥的逻辑法则所取代”^[5]。

在《世界历史札记》中,霍米亚科夫只是笼统地将批判对象指向当时的德国历史科学,但据其在《黑格尔的历史体系》(Гегелева система истории)、《现实与对其理解的混淆》(Смешение факта с его разумением)、《黑格尔的错误》(Ошибка Гегеля)等文章中的论述,可知其批判的主要对象乃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他认为,西方曾试图改变其历史科学的狭隘性,但无论是宗教意义上的尝试还是哲学意义上的改进都没有成功,即使是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的尝试也是失败的。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上半叶,由赫尔德开始的历史运动到黑格尔而达至顶峰。黑格尔在1822年至1828年和1830年至1831年关于世界史哲学导论的讲演中提出了“哲学的历史学”,即历史哲学,主张以哲学的方式研究历史的思想。继承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 的普遍历史观念, 黑格尔认为历史存在一个普遍目的, 这一目的源于历史表面经验事件背后的思想。黑格尔从概念出发的理性主义历史观点既不同于先前赫尔德的浪漫主义史学, 也异于同时期兰克从史料出发的客观主义史学, 它延续的是康德结合启蒙主义史学与浪漫主义史学而形成的理性主义历史观念。康德的基本观念是历史朝着合理性的方向不断进步, 并将“以往的历史看作是人类之非理性的一幕并且期待着一种理性生活的乌托邦”^[6]。黑格尔把理性视为一切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的无穷材料, “理性支配世界, 因而世界史也是以理性的方式进行的”^[7]。霍米亚科夫认为, 黑格尔理性主义历史哲学的片面性在于概念化、公式化地理解历史。因为“黑格尔的历史体系和其数学体系一样……将事实的公式当作现实运动的原因”^[4], 把公式视为现象的条件。例如, 认为行星运动的公式是其运动的原因, 地球绕着太阳旋转不是由于对立力量的斗争, 而是由于椭圆公式。实际上, 公式只是可能性的法则, 而不是运动赖以存在的现实性。由此, 黑格尔不是从一个民族的全部活动中总结其规律, 而是先预设了逻辑公式并将其视为历史活动的原因。

概念化地认识历史, 意味着依赖概念的逻辑推理, 将世界历史视为由抽象概念主导的运动过程。在黑格尔之前, 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 先验地构造历史, 将历史视为由一个概念导致下一个概念的逻辑序列, 事件与事件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将历史视为概念的体现, 是康德的范畴格局学说, 即“前后的时间-关系就是逻辑的前件与逻辑的后件的概念关系中的一种格局”^[6]在历史学上的应用。黑格尔吸收了费希特的思想, 把事件背后的思想看作逻辑上相联系的概念的锁链, 事件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世界史表现的是自由意识及其实现的过程, 它是一个阶段进程, 是自由的一系列进一步规定, “这些规定是通过事实——在这里, 也就是指变得能意识自身的自由的本性——的概念产生出来的”^[7]。

总体而言, 霍米亚科夫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哲学的批判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 在认识历史的方式上, 黑格尔概念化地理解历史, 以逻辑公式作为历史活动的原因, 而仅依靠逻辑理性无法获得对历史的真实而生动的理解。其二, 在观念上, 历史被视为一个由抽象概念主导的逻辑发展的过程。这一批判源于他对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理性”的理解。黑格尔将理性视为世界历史发展的目的和动力, 即“世界史本身只不过是显现这同一种理性的一种方式, 是理性显现自身的各种特殊形态之一”^[8]。但是, 霍米亚科夫指出, 这一理性的内核抽象而空洞, 以理性方式进行的历史变成了对概念和逻辑法则的遵循, 这种历史观念是对生命之生动性的磨灭。

2 从“我在”到“我思”：历史的认识路径

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批判实际上包含着对其认识论基础的批判, 在批判的基础上, 霍米亚科夫阐明了他的认识论思想并将其应用于历史哲学的构建。他指出, 康德至黑格尔这一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流派的认识论存在一定的缺陷, 并在黑格尔那里发展到了顶点: “这一错误在其创始人康德身上并不明显, 在其继承者黑格尔身上却有鲜明的特点”^[4]。这种错误就是混淆了概念与现实, 即“不断地把个人理解中概念的运动与现实本身的运动等同起来”^[4], 这体现的是以逻辑理性认识历史的方式。德国历史研究“由于其共同具有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根源而具有一定的统一性”^[9],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构成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认识论基础, 因而对黑格尔历史认识方式的批判与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认识论思想的批判是同步的。霍米亚科夫指出德国唯心主义哲学遵循着一条纯粹理性主义的道路, 笛卡尔的“我思, 故我在”已经隐含着主体二元论裂缝,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也未能克服这一主体二元论的矛盾, 思考主体与存在主体始终无法统一, 最终让认识的道路“受制于理性主义的诱惑, 因而无法获取整全真理”^[10]。正是认识论上的理性主义造成了这一学派的片面性——“只认识可能的真理, 而不认识现实的真理; 只认识规律, 而不认识规律所体现的世界”^[4], 即混淆了概念与现实。所以, 尽管“谢林与黑格尔试图用‘同一性’哲学在逻辑上克服二元论的矛盾。然而, 斯拉夫派却认为, 谢林与黑格尔对主体二元论的克服, 仍然是一种停留于

外在逻辑层面的形式同一,并未实现整全真理(integral truth)的获得”^[10]。

当认识论上的理性主义蔓延到历史研究领域时,就暴露出以逻辑理性认识历史的缺陷。对此,霍米亚科夫说:“黑格尔的整个历史体系不过是对因果范畴无意识的重新安排”^[4]。他举例说:“我看看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建造的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从我看到这个穹顶的事实中,我清楚地知道它是存在的,它是米开朗基罗建造的。在我的脑海中,过去的印象受到现在印象的制约。如果穹顶不存在,我就不可能看到它。我看到了它:因此,它存在。这个结论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我说它是因为我看到它才建成的,所有正常人都会说我疯了”^[4]。为了避免这一荒谬的结论,黑格尔及其追随者们构建了一种严格按照逻辑必然性法则去认识历史的思想体系,这种概念化的历史运动因远离了活生生的、真实的存在而无法正确认识历史运动的内在发展逻辑^[4]。因此,霍米亚科夫总结道,黑格尔的思想进程表现为“一切真实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必然的,因此,过去的历史决定随后时代的存在”^[4],这一观念所暗示的认识路径有内在的矛盾。把“我看到教堂穹顶”当作“教堂被建造”的原因,遵循的是从“我思”到“我在”的认识路径,即黑格尔所说的历史过程。黑格尔将思考存在置于感知存在之前,将概念置于认知对象之前,将历史批判的逻辑当作历史的因果关系,把历史视为由逻辑推理指导下的概念运动。相反,教堂穹顶的存在经由主体的观看而被意识到,乃是先观察后认识的过程,遵从“我在”到“我思”的路径,教堂建筑的历史过程先于我对它的认识。这一认识的背后是历史的实际进程,即教皇想要建造圣彼得教堂,然后他任命了米开朗基罗建造这座教堂,最后我才能看到教堂的现实形象并了解其历史。

认识论的不同反映了俄罗斯哲学思维与西方哲学思维之间的差异。西方哲学的认识路径是将理性思考从认识过程中抽离出来,认识过程因而变成了理性思考封闭而独立的发展,远离了现实中生动的存在,此时思考主体与感知主体是分离的。俄罗斯的哲学思维相反,它是一种与存在相融的有机的思维,主张哲学思考应当“从活的东西开始,从先于一切理性反思和理性分解的东西开始,从有机的思维开始,从作为生命之功能的、与自己的存在根源相统一的思维开始,从尚未被理性化的意识的直接材料开始”^[11]。因此,俄罗斯的哲学思维体现为从“我在”到“我思”的路径,而非从“我思”到“我在”的路径。在认识活动中把现实抛开是不可取的,只有先沉浸于现实、扎根于存在中,才可能真正认识真理。

研究者白晓红指出,“与斯拉夫派一贯的反西方唯理主义观点相适应,斯拉夫主义的哲学基本认识是本体论的,强调生命事实对于思维的优势,强调‘活的知识’对于认知的意义,强调人的全部精神因素的完整性”^[1]。意识到西方认识论上的理性主义无法达到整全真理后,斯拉夫派提出以“完整的精神”认识真理,遵循从“我在”到“我思”的认识路径。在获取真理的过程中,仅依靠逻辑推理得来的只有抽象的理性认识,它不足以认识整全的真理,并且逻辑理性终会达到它的极限,因此还需运用包括感觉、美感、良心、爱在内的人的所有认识能力。实际上,霍米亚科夫并不排斥由逻辑推理得来的理性认识,他反对的是把逻辑论证当作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他说:“如果仅仅因为真理不是以三段论的形式出现,就否认真理,那么这门科学就会死亡”^[5]。霍米亚科夫认同认识过程中的精神完整性,但更强调其中的非理性因素,以弥补存在于黑格尔历史哲学中偏重于逻辑理性的片面性。在《世界历史札记》中,霍米亚科夫强调诗人和艺术家的感情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理解历史中人类的精神生活,“更有用的是诗人和艺术家的感情。学识可能会欺骗人,敏锐的理智倾向于悖论,而艺术家的感觉是对内在真理的感知,它既不会欺骗人,也不会被人欺骗”^[5],因在这一认识方式下得到的是“活的知识”。“活的知识”是一种“直接的、活生生的、无条件的知识”^[4],它不是从逻辑中而是由直接感知现实而产生的。他举例说,“失明的科学家对光一无所知,他知道的关于光的规律只是从视力正常的人那里得到的数据”^[4],两者在认识事物上的差异,就是“活的知识”与从概念中抽象出来的知识之间的差别。

霍米亚科夫追溯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片面性背后的认识论基础,即德国唯心主义中由“我思”到“我在”的认识路径。因德国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思想存在主体二元论矛盾,受困于理性主义,

便暴露出以逻辑理性认识历史的片面性。与此不同,斯拉夫派的认识论思想,即“完整的精神”,体现的是从“我在”到“我思”的认识路径,强调感知现实与理性思考的合一。霍米亚科夫从“完整的精神”发展出以“诗人和艺术家的感情”认识历史的方式,直觉地感知民族的生命与人类的精神生活,以“活的知识”所具备的现实感克服概念的抽象性。

3 建构有机的历史哲学

对霍米亚科夫而言,比起将历史视为一个理性发展的过程,将历史视为由信仰及其体现的精神原则所推动的运动,更贴近生命的有机本质。别尔嘉耶夫认为,在霍米亚科夫的历史哲学中“有一种对过去的浪漫理想化,承认艺术直觉对历史的重要性,以及对历史进程的有机理解”^[12]。“有机性”概念融入了霍米亚科夫思想的许多方面,在认识论上体现为与存在相融的有机的思维,在宗教哲学上体现为作为有机体的教会,而社会意义上的有机性是指一种有机的社会组织方式,同样,历史也被视为一个有机体。

别尔嘉耶夫指出,霍米亚科夫的历史哲学“是在十九世纪初世界浪漫主义精神的氛围中萌芽的”^[12],并且斯拉夫派对历史的有机理解也与之相关:“有机性观念自身是他们从德国浪漫主义者那里拿来的。有机性是他们关于完善生活的理想”^[2]。历史学家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Рязановский, 1923-2011)专门研究了斯拉夫派与浪漫主义之间的影响关系,认为斯拉夫派在精神上是浪漫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斯拉夫派深受西方浪漫主义意识形态影响,这一事实已毋庸置疑”^[13]。

“有机性”(организм)是从德国浪漫主义而来的概念,其本质是一种将精神的发展类比为生命过程的世界观。赫尔德认为世界是一个有机体,从宇宙到地球、从植物到人类的演化具有内在的有机性,其进程是从母体中发展出更高的有机体。他进而提出了历史有机体的概念,认为人类的不同种族在历史演进中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人类历史的起点如同一粒种子,其“最初的发展与我们看到的自然造物一样简单、微妙与神奇”^[14],因此人类最初的倾向、习俗和制度具有重要意义。赫尔德之后,德国历史哲学发展至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哲学家时,这些浪漫因素很大程度上被理性因素取替了。德国浪漫主义和唯心主义同样重视“有机性”概念,“有机性”得到了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 1775-1854)的进一步发展,其“有机民族概念和民族使命理论深深吸引了俄国知识分子”^[13]。谢林之后,黑格尔以理性规范思维,他的历史哲学是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观的体现,其核心是说明作为世界本原的绝对精神如何外化于自然和社会。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自由意识从东方世界发展至日耳曼而趋于成熟,这一演变类似于生命的发展,但最终统摄于逻辑必然性法则之下。霍米亚科夫意识到浪漫主义史学走了一条与黑格尔历史哲学不同的道路,因此他对“有机性”概念的理解与使用基于浪漫主义视野,最终其历史哲学也并未走上一条理性主义道路。霍米亚科夫对“有机性”概念的借鉴体现在对人乃至社会的认识中,他主张:“社会和人一样,不是按照逻辑的方式来认识自己的。它的意识就是它的生命;它在于习俗的统一,在于道德和思想动机的一致,在于活生生的、不间断的思想交流,在于创造一个民族及其内在历史的整个无休止的运动。它只属于民族的个性,就像人的活生生的内在意识只属于他的适当个性一样。外国人和那些自愿或不自愿与之疏远的社会成员是无法接触到它的”^[4]。由此,当“有机性”概念进入历史哲学思想中时,历史便不是概念的序列发展,而是一个有机发展的过程。

历史的有机发展,首先体现在民族生命的有机发展中。浪漫主义者主张激活在民族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基本精神原则,这些精神原则后来也成为霍米亚科夫的主要关注点。他关注民族的初始因素,即信仰,认为信仰决定了文明的源流与性质,是各民族历史的神秘起源。正如一棵树从种子中生长出来,一个民族也是从其基本原则中有机发展起来的,这种精神原则决定着民族的命运。在《世界历史札记》中,由民族历史构成的世界史,其开端存在两类宗教信仰,一类是伊朗

式宗教，一类是库辛特式宗教。两类宗教体现的精神被概括为伊朗原则（иранство）和库辛特原则（кушитство），伊朗原则体现的是自由和精神性，与其对应的是“土地占有民族”^[1]，库辛特原则体现的是必然性与物质性，与其对应的是“征服性民族”^[1]。就每一民族而言，其精神原则由伊朗原则或库辛特原则所主导。世界历史表面上呈现为各民族间的冲突与博弈，实则在于两个精神原则——伊朗原则与库辛特原则，即自由与必然性、精神与物质之间不断斗争的过程。民族的发展与宗教精神息息相关，东西方教会的分离使东正教教会的聚和性（соборность）呈现出自身的优势，霍米亚科夫的历史哲学与其宗教哲学在此相呼应。他将俄罗斯视为伊朗原则的承载者，将西方视为库辛特原则的承载者，由此将西方与俄罗斯的对照写进了历史的框架中，为论述俄罗斯历史的有机性与西方历史的必然性奠定了基础。与西方派类似，斯拉夫派研究历史的目的也在于构建俄罗斯未来的社会道路，但霍米亚科夫的历史哲学最终并非指向西方式的国家建制，而指向了有机的、聚和性的社会，并为其寻找历史渊源。梁赞诺夫斯基指出：“斯拉夫浪漫主义者与西方浪漫主义者一样，呼吁建立一个有机的社会，发展社会生活和各种社会活动；他们害怕‘个人原子化’，即害怕社会分裂为孤立和相互敌对的个人。霍米亚科夫和伊万·阿克萨科夫对这种危险的警告，与诺瓦利斯、巴德尔、戈尔雷斯以及西方其他浪漫主义思想家的类似告诫形成了俄罗斯的对立”^[13]。霍米亚科夫对库辛特原则的憎恨，源于他对以武力建立国家的西欧民族的敌意，而他对俄罗斯村社“米尔”（mir）的偏爱，在于村社是以有机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在这一点上，斯拉夫派普遍认为俄罗斯因村社和东正教的存在而优于西方。由此，俄罗斯社会的有机性与西方社会的必然性形成了对比，“土地上的劳动者的和平生活方式，与大地的有机联系，是俄罗斯历史的基础”^[12]，它并无西方社会的阶级分化与等级制度，后者是必然性原则的体现。

霍米亚科夫将俄罗斯的有机性投射到前彼得时代，因古代罗斯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范例和根本原则，尽管这些范例与原则后因统治的不足和外敌的压迫遭到了毁灭，但俄罗斯不像西方那样需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俄罗斯“有足够的能力让过去得以复活，弄清楚这些旧事物，并将之带入人们的意识和生活”^[15]。因此，彼得一世改革后的时代必须尽快结束，俄罗斯应尽快回到其有机发展的历程中。因而，霍米亚科夫难以认同黑格尔所描述的历史过程，对黑格尔而言，普鲁士是日耳曼历史的真正原因，人类历史发展到日耳曼民族那里获得了较高的自由意识，并体现在现实的普鲁士中。但对斯拉夫派来说，未来俄罗斯的所有重要元素都必须有机地源自俄罗斯过去，前彼得时代中存在的有机成分才应该成为构建未来俄罗斯的材料。同理，真正的自由精神要回溯至历史的开端，作为伊朗原则的承载者，俄罗斯应拾起伊朗原则所内含的自由精神，而非转向由库辛特原则主导的西方。因充分强调俄罗斯道路的特殊性，斯拉夫派欲以从古罗斯流传下来的村社制度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危机，但该理想却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俄国的现代化进程。斯拉夫派成员坚信，村社的有机性源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积淀，农民在村社中依照惯例分配、耕种土地，这种劳动方式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缺乏的道德精神，但他们把村社所能发挥的作用看得过于理想，若村社作为经济基础长期保存下来，将不利于俄国的工业发展。对此，别尔嘉耶夫评论道：“斯拉夫派把自己的俄罗斯思想，以及自己关于完善制度的理想乌托邦与俄罗斯历史的过去混为一谈”^[2]。

总之，“有机性”被视为在西方道路与俄罗斯道路之间抉择的一个重要参考，为坚持俄罗斯历史传统的重要性，霍米亚科夫将西方视为一个被错误原则激活的有机体，西方的一切都已机械化和理性化，其历史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便说明了这一点。

4 结语

斯拉夫派将西方的理性主义视为恶的根源，他们不仅在哲学上也在历史研究上与其展开互动。为寻求俄罗斯真正的发展道路，霍米亚科夫在其学术探索中发现了贯穿西方与俄罗斯精神生活中的“片面性”与“完整性”、“必然性”与“有机性”之间的对立，这对立的根源在于西方理性

主义与俄罗斯精神之异。霍米亚科夫比其他斯拉夫派成员更清晰地意识到黑格尔历史哲学对俄罗斯社会的不适用性,因这一被纯粹理性主义所渗透的历史哲学过分依赖概念和逻辑推理,难以获得对历史的生动理解,其认识论基础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从“我思”到“我在”的认识路径存在主体二元论矛盾,而俄罗斯从“我在”到“我思”的有机思维与斯拉夫派的“精神完整性”认识思想可弥补黑格尔等学者以逻辑理性认识历史的片面性。同时,受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德国浪漫主义的“有机性”概念和浪漫主义史学观念影响了其历史哲学的建构。与所有斯拉夫派成员一样,霍米亚科夫坚信俄罗斯成长于东正教的灵性土壤,其历史研究也以宗教信仰发端,库辛特原则与伊朗原则的对抗即是西方与俄罗斯对比的写照。对“有机性”概念的借鉴,一方面源于超越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唯理性局限的需求,一方面与俄罗斯思维、生活方式的有机性相呼应。霍米亚科夫有机的历史哲学,在观念上体现为民族历史的有机发展,在现实中体现为从古罗斯延续下来的村社制度,有机组织的村社与聚和性的东正教便是优于西方制度的、独具俄罗斯民族性的东西。霍米亚科夫的哲学思想推动了独立的俄罗斯思想的形成,这是正面的,但他对村社和东正教的设想是理想化的,又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参考文献:

- [1] 白晓红. 俄国斯拉夫主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51+78+79+105.
- [2] [俄]别尔嘉耶夫. 俄罗斯理念[M]. 张百春,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4: 43+51+52.
- [3] [英]伯林. 俄国思想家[M]. 彭淮栋,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100.
- [4] Хомяков А.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1[M]. Москва: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 1900: 20+34-37+144+273+274+280+296.
- [5] Хомяков А.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5[M]. Москва: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 1900: 31+51+52+55.
- [6] [英]柯林武德. 历史的观念[M]. 何兆武, 张文杰,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146+167.
- [7] [德]黑格尔. 黑格尔全集: 第18卷, 讲演手稿II: 1816—1831[M]. 沈真,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128+175.
- [8] [德]黑格尔. 黑格尔全集: 第27卷, 第I分册, 世界史哲学讲演录[M]. 刘立群,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26.
- [9] [美]伊格尔斯. 德国的历史观: 从赫尔德到当代历史思想和民族传统[M]. 彭刚,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1.
- [10] 毕晓, 李雪. 早期斯拉夫派宗教哲学家对德国唯心主义的阐释与批判[J]. 哲学评论, 2021(02): 1-20.
- [11] 徐凤林. 俄罗斯宗教哲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3.
- [12] Berdyaev N. Aleksei Stepanovich Khomyakov[M]. translated by Fr.S.Janos. Mohrsville: frsj Publications, 2017: 104+125+205.
- [13] Riasanovsky N. Russia and the west in the teaching of the slavophiles: A Study of Romantic Ideology[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16-17+165-166+171.
- [14] Herder J. Another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M]. translated by Ioannis D. Evrigenis and Daniel Pellerin.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4.
- [15] [俄]霍米亚科夫. 俄国思想的华章[M]. 肖德强, 孙芳,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10.